

当代 西方国家 财政

隋启炎 主编



出版社

6231257

前　　言

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加强，西方国家政府对经济实行范围空前广泛、程度日益深入、作用越来越大的干预调节，这种干预调节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作为占有和分配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财政杠杆来实现的。因此学习和研究当代西方国家财政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是为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本科生学习资本主义财政编写的试用教材，也可为兄弟院校有关专业的学生以及涉外工作者学习参考。

本书的特点是：不仅对当代西方财政的内容进行简明的阐述和分析，而且对与当代世界经济密切联系的重要财政问题作较深入的探讨；本书第九章“西方财政的国际性质”，为国内财政教科书所仅见。

本书由隋启炎主编。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章由隋启炎编写；第十章由胡文武、隋启炎编写；第十一章由徐柏喜、范宁、隋启炎编写；附录由詹凤兰、黄春姣、姜文编制。

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刘涤源、吴纪先、郭昊新、朱景尧、周新民等同志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谨在此深表谢意。

限于编者水平及资料、时间等条件，书中疏漏和错误定会不少，诚恳期待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9年9月于武汉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结论	(1)
第一节	财政的概念	(1)
第二节	资本主义财政的职能和作用	(5)
第三节	垄断资本主义财政与垄断前资本主义财政 比较	(12)
第四节	当代资本主义财政与社会主义财政比较	(16)
第二章	西方国家财政支出	(20)
第一节	财政支出的内容和结构	(20)
第二节	财政支出增长及其原因	(28)
第三节	财政支出的影响	(36)
第三章	西方国家财政支出效应分析	(45)
第一节	成本效益分析	(45)
第二节	成本效益分析释例：交通运输项目选择	(54)
第三节	西方国家财政支出效益与私人企业支出效益 比较	(60)
第四章	西方国家财政收入	(63)
第一节	西方国家财政收入的概念和分类	(63)
第二节	西方国家国有财产收入	(66)
第三节	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收入	(69)
第四节	西方国家行政收入	(76)
第五章	西方国家税收（上）	(80)
第一节	税收的定义和基本特征	(80)

第二节	税制的构成和税收分类	(82)
第三节	资本主义国家税收原则	(86)
第四节	税收的转嫁和归宿	(91)
第六章	西方国家税收(下)	(97)
第一节	所得课税体系	(97)
第二节	商品课税体系	(109)
第三节	财产课税体系	(127)
第四节	西方国家税收改革趋势	(131)
第七章	西方国家公债	(137)
第一节	西方国家公债发展及其原因	(137)
第二节	公债的概念和实质	(140)
第三节	西方国家公债的种类、发行和偿还	(142)
第四节	西方国家公债的影响	(147)
第五节	西方国家公债管理	(152)
第八章	西方国家财政预算制度	(158)
第一节	财政预算的概念和类型	(158)
第二节	预算工作程序	(161)
第三节	美国预算程序	(165)
第四节	赤字预算及其影响	(168)
第九章	西方国家地方财政	(174)
第一节	战后西方国家地方财政的迅速发展	(174)
第二节	西方国家地方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180)
第三节	中央财政给地方财政的补贴	(187)
第十章	西方财政的国际性质	(194)
第一节	西方国家的国际信贷	(194)
第二节	联合国财政	(202)
第三节	欧洲共同体财政	(205)

第四节	跨国垄断公司课税及有关问题	(210)
第十一章	资产阶级的财政理论	(220)
第一节	英国古典学派的财政理论	(220)
第二节	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财政理论	(226)
第三节	凯恩斯学派的财政理论	(231)
第四节	货币学派的财政理论	(238)
第五节	供给学派的财政理论	(244)
附录：	一、西方国家财政主要统计资料	(250)
	二、国内外主要参考文献	(273)

第一章 絮 论

第一节 财政的概念

“财政”一词出自拉丁语“Financia”，意指货币支付。早在13世纪至15世纪，由于意大利许多城市（如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处于当时欧洲贸易和金融的中心，该术语在意大利得到广泛的使用。后来，这一术语转化为法语“Finance”、德语“Finanz”、英语“Finance”等，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始用作与货币有关的制度，以及国家为履行其政治、经济职能而筹措货币资金相联系的概念。

财政是一经济范畴（Economic Category）。它代表一定条件下的经济关系或一定的生产关系。目前我国经济学者对财政定义的看法颇不一致，其主要观点可归纳如下：

1. 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Distributive Relation）。简称国家分配说。关于国家分配说，我国经济学者又有不同的理解。

一种意见认为，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分配一部分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所形成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种财政分配关系是与国家本质紧密相连的。财政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它是为了维持国家的存在和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从社会产品分配中产生并独立出来的一个分配范畴。财政的性质是由国家及其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财政一旦产生，就不仅作为国家获得其存在和行使职能的物质需要的一种手段，而且作为国家作用于它的经济基础的重要手段而

发挥作用。

另一种意见认为，财政是国家对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价值形式进行的分配关系。财政既与国家发生本质联系（Essential link），又与商品货币发生本质联系。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分裂为价值的分配和使用价值的分配，财政亦随之独立出来，成为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中特殊的组成部分，即对价值的分配。因此，财政的产生必须要具有两个前提：国家的产生；商品货币经济的产生。

2. 财政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扩大和发展，产生公共需要而产生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对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的分配活动。人类社会各个经济形态存在的劳役、实物分配、货币收支等由于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分配都是财政。因此财政与国家、与商品货币都没有本质联系。

3. 财政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剩余产品出现以后逐渐形成的对剩余产品的分配过程，是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组成部分。离开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不可能正确地揭示财政的内涵。因此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是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尽管第二、三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第一种观点更为可取。因为，前者不是像后两者把财政与国家割裂开来，而是把财政与国家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财政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当国家未出现时，只有社会经济分配关系，没有财政分配关系；当国家产生以后，财政分配关系才从社会经济分配关系中独立出来，为国家意旨履行其职能。另一方面，国家的存在又必须以财政活动为条件，没有财政活动，国家的一切活动是难于进行的。恩格斯说：“为了维护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捐税了。捐税是氏族社会所完全不知道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十分熟悉它

了。”^①各国的历史情况，均已证明恩格斯论断的正确性。

有的观点认为，把财政同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就意味着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决定经济基础（Economic base），就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对此我们不能苟同。因为它忽视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辩证统一的关系，忽视了上层建筑还可以而且还是积极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斯大林说：“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②我们认为，财政是有它产生的经济基础的，但是财政的产生，又毕竟以国家产生为前提。因此任何社会形态的财政无不打上国家的烙印，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财政。不认识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或掌握财政的实质。

从上述思想出发，我们不能同意关于财政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对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分配活动的观点。这是由于：第一，在阶级社会里，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不仅仅限于满足公共需要所进行的分配活动。众所周知，在国家出现以后，伴随而来的财政范畴（如捐税、国债等）是为了满足某种特殊需要而产生的，而且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某种特殊需要远远会超过公共需要。马克思曾经指出“常备军和官吏”是资产阶级政府“两项最大的开支”。^③如果把财政表述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活动，那末就不能说明当代财政包括庞大的军事费用等特殊性开支。第二，在阶级社会中，所谓公共需要，皆是为了维护一小撮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64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1页。

剥削者的利益的。恩格斯指出：“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①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完全证明了恩格斯观点的正确性。众所周知，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兴办的公共需要的社会设施（如学校、医院以及文娱场所等）一般属资本家开办的，其目的是为了从广大群众身上榨取更多的金钱。即使是国家举办的公共事业，也无一不是为了维护他们的上层建筑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忽略财政的本质，就会忽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我们也不能同意关于财政是剩余产品分配过程发生的关系的观点。诚然，这种观点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即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劳动者除必需的生活费之外，有了剩余，从而出现了分工，出现了国家，同时也出现了财政分配关系。但是它没有揭示财政分配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财政分配关系是从社会产品分配关系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分配关系，它是凭借国家权力实现的。这种分配关系同氏族公社中整个社会的分配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中产品分配是完全平等的。但是随着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发展成为国家，社会分配关系也就发生了极不平等的、质的变化。为了维持国家这方面的费用以及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便出现了捐税，出现了财政。因此把财政分配同国家关系割裂开的观点是不可取的，欠妥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6页。

第二节 资本主义财政的职能和作用

英、法、德文 Function 和俄文 Функция 均可译为职能、功能、职责、任务、作用和意义，由此可见，职能和作用存在着密切联系，有时两者甚至可相互通用，它们均能说明同一事物的本质，揭示本质的内涵。但是严格来说，职能和作用尚存在着区别：职能是事物内涵所具有的一种功能或能力，作用则是职能所表现出的行为或结果。财政职能是财政内在的或潜在的能力，财政作用则是这种能力的表现或体现。

一、资本主义财政的职能

关于资本主义财政职能，我国经济学者看法不一。有的说它有5种职能，即筹集资金，供应资金，调节，平衡和反映监督；有的认为它有三种职能，即分配，调节和监督；有的主张它仅有的一项分配职能。我们认为，它具有两种职能，即分配职能和干预调节职能。

1. 分配职能

财政分配是一个经济范畴，取决于物质资料生产状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①并就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指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49页。

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① 马克思这些论述可概括为两层意思：一是生产发展的规律和水平决定着财政分配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二是生产关系决定着财政分配的性质和政策。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人们以什么样方式占有生产资料，决定着他们以什么样方式参与分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财政分配就是资产阶级国家通过财政预算经济杠杆，对一部分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以实现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需要。

资本主义财政分配职能主要表现为下述两个方面：

第一，对国家资源的分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是市场经济。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本身存在“不完全性”（imperfection），例如资源转移因垄断影响受到限制，产销之间缺乏选择产品的情报等，由于市场机制存在不能提供必要的、社会的商品和劳务等缺陷，资产阶级国家就采取财政税收和支出等措施，决定或影响资源分配的规模和方向。财政税收能减少某些商品与劳务的消费、投资和生产。例如，对社会有害的某些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政府可以通过重税手段对其加以限制或取缔。财政支出则能增加某些商品与劳务的消费、投资和生产。例如，社会基础设施工程一般由政府通过财政预算拨款或资助来兴建。资产阶级政府试图通过国家财政政策和措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可以使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以满足社会成员或宏观经济的需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上述资源分配或调整，不仅不使资本家的利益减少，相反，他们还会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

第二，对收入的再分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市场机制（Market mechanism）造成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均，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45页。

产阶级的财产和收入远远多于无产阶级，并形成贫富悬殊。资产阶级政府一方面通过累进税率，把资本家的一部分收入征收起来，另一方面通过各种补贴措施把资金转移给低收入的工人群众，从而试图达到社会认为“公平”和“正义”的分配状态。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上述措施对于财富不均仅起一点抑制作用，并不能根本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累进税率名义上是随个人收入变化而变化，当收入提高时，税率和课税额也随之提高，但西方国家的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垄断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把各种税收转嫁给劳动人民，加强劳动人民的税收负担。而垄断资产阶级则可通过偷税、减税、免税等途径向政府所缴纳的税款相对下降。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对收入的再分配是有利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的一种分配。

2. 干预调节职能

资本主义财政干预调节职能是指国家财政具有干预调节国民经济的功能。西方国家财政干预调节经济一般是按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模式进行的。凯恩斯学派认为，社会生产和就业水平取决于社会总需求(General demand)和总供给(General supply)的均衡，社会总需求(总支出)分为消费和投资两个部分，社会总供给(总收入)分为消费和储蓄两个部分。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也就是投资与储蓄的均衡。在没有国家干预调节的情况下，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投资与储蓄的均衡，不能达到充分就业。易言之，由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投资小于储蓄，一部分商品找不到销路，就需要减少生产，解雇工人，这样形成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远远低于充分就业水平，就会造成生产下降和大量失业。面对这种情况，西方国家便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私人消费和企业投资，以增加社会总需求，于是就可以使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均衡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这就

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干预调节经济的理论根据。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干预调节经济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财政赤字调节（Deficit regulation）。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西方国家政府财政预算只求周期平衡，不需年度平衡，即使财政预算支出大于收入，实行赤字预算。当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大量增加时，政府税源缩小，收少减少。如果保持预算年度平衡，势必削减支出，这就导致社会总需求的紧缩；如果增加政府支出，而为了平衡年度预算，势必提高税率和增加税收，并引起人民的反对，也不能达到扩大社会总需求的目的。因此只有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才能扩大社会总需求，以达到“反危机”的目的。战后以来，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均以财政赤字干预调节经济过程。

第二，税收调节（Tax regulation）。税收是资本主义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又占整个税收的主要部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调节，主要是通过所得税的减少或增加来扩大或缩小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和公司或企业的纳税后利润，从而扩大或缩小社会总需求。在经济危机或萧条时期，政府可减少税收，以增加总需求，扩大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在繁荣时期，政府可增加税收，以减少总需求，缩小投资，并抑制通货膨胀。

第三，各种补贴调节（Subsidies regulation）。各种补贴是财政调节经济的另一种手段或方式。在经济危机或萧条时期，西方国家政府对失业者提供失业补助金，以增加社会购买力，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了“反危机”、“反周期”，美国政府曾制定和实行所谓的“收入维持方案”。它包括失业补助，社会保证（对老年、死亡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保险），食品券补贴（发给所规定的最低收入家庭，对食品券金额的全部或一部分由政府补贴）等。这些转移支付对于增加个人可支配的收入和扩大

个人消费无疑会起一定作用。此外，西方国家政府对公司或企业提供各种补贴，来干预调节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

二、资本主义财政的作用

战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加强，财政杠杆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调节经济的强有力的工具，对经济发展过程和整个社会生活日益发挥巨大作用。现以税收为例，来阐述和分析西方国家财政的作用。

从有利的角度看，其作用主要有：

1. 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税收是资本主义财政收入资本化的重要源泉。战后以来，美国政府不断从财政收入中拨款兴办投资多、周转慢、风险大的企业，例如国家银行、科研中心、原子能工厂、宇航业以及各种社会公共设施等。8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国内投资比70年代初期增长一倍以上，同期，联邦政府国内投资增长77%以上。这些增长的投资额，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税收。由此可见税收对促进美国国有垄断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起着颇为重要的作用。

税收是西方国家政府向私人垄断组织提供各种津贴和优惠的重要物质支柱。在剩余价值生产方面，西方国家向私人垄断组织提供多种补贴和优惠贷款，为私人垄断组织解决部分资金来源，或者挽救处于破产边缘的企业；在剩余价值实现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矛盾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西方国家政府日益以各种手段为私人垄断组织开辟国内外市场，即国家日益扩大国家采购（特别是军事采购），为私人垄断组织顺利实现军事产品，获取经常而高额的垄断利润。

加速折旧（Accelerated Depreciation）是刺激私人垄断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二次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垄断资本统治的加强，西方国家加速折旧有进一步加强之

势。1962年美国实行新的折旧法，规定机器设备的标准折旧年限为8—15年，到1981年里根总统实行“3—5—10”新的折旧计划，即规定小轿车、轻型卡车的折旧年限为3年，机器设备为5年，厂房、仓库及其公共建筑为10年。这种加速折旧除为大公司减税、逃税提供有利条件外，还对技术革新、固定资本更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发展生产亦具有促进作用。

2. 在某种程度上延缓经济危机（Economic crisis）的爆发和减轻危机的破坏程度。美国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以及社会保险税是西方国家经济最重要的自动稳定器（Automatic Stabilizer）或内在稳定器（Builtin Stabilizer）。

首先，从所得税的角度看，在经济繁荣（Economic prosperity）阶段，生产迅速发展，产品大量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均急剧提高，从而容易发生通货膨胀以及因生产过分扩张而导致经济衰退的危险。但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多年来实行累进税率，一方面可使达到起征点的人数增加，而使税收增加，另一方面可使达到高档次税率纳税人数增加而使捐税增加。税收增加的结果，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经济活动的过分扩张，延缓经济危机的发生。相反，在经济萧条（Economic depression）阶段，由于销售条件恶化，生产萎缩，产量大幅度下降，企业和个人收入剧降，税收自然明显减少，从而可以防止经济活动下降太远，起着抑制危机进一步深化的作用。

从社会保险税角度看，在经济繁荣阶段，社会保险税自然增多。因为社会保险税带有强制性，必须按规定投保，缴纳保险税。社会保险税增多，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的过分扩张，延缓经济危机的发生。在经济处于危机阶段，失业率上升，失业职工领取的失业津贴金增加，社会购买力增强，这就能减轻经济衰退的压力，抑制危机深化程度。

无可讳言，上述作用不可能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亦不可能阻止经济危机的进程。因为西方国家经济周期的运动变化，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一切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同产品私人占有性之间的基本矛盾。

3. 促进西方国家商品输出（Merchandise exports）和资本输出（Capital export），鼓励本国跨国公司向海外进行扩张和渗透。二次大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鉴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市场竞争（Market competition）的加剧，西方国家政府为了使本国商品打入国际市场，日益采取各种保护贸易主义的措施来“奖出限入”。在奖励本国商品出口方面，西方国家主要采取租税减免、出口补贴、出口信贷等财政金融政策以加强本国商品出口的竞争能力。在限制外国商品进口方面，西方国家经常采取惩罚性的税收政策和措施，即对于得到外国政府补贴的进口商品，进口国一般征收抵销关税，对低于“起动价格”的商品，一般征收反倾销税。

为了鼓励和支持国内过剩资本输出，西方国家经常对自己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给予免税、减税以及其他优惠条件。

除了上述对经济有利的作用外，财政调节的消极后果也是很严重的，这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贫困问题上。众所周知，税收是西方国家政府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资本主义税收的绝大部分总是直接或间接地由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来负担的，从而必然导致他们贫困程度的加深。据统计，70年代初期，美国生活在贫困线（年收入低于6 700美元）以下的人数2 47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1.6%，到80年代初期，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增至3 44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这种情况必然使劳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加剧，最终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



第三节 垄断资本主义财政与垄断前资本主义财政比较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列宁指出：“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①。垄断作为一种经济关系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适应着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日益发展的生产力社会性要求，同时它又很快逐渐变为基本上起阻碍的作用。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加深，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市场和瓜分世界的斗争日趋激化。两次帝国主义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世界大战，以及1929—1933年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摇摇欲坠，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干预经济的实质就是垄断资本集团利用控制的国家政权，把国家的力量和垄断组织的力量结合起来，保证垄断资本最高垄断利润。此时，国家作为“总资本家”拥有着相当大的一部分财富（Wealth），控制着社会再生产的各个领域、部门和环节，实行范围空前广泛、程度日益深入、作用越来越大的干预和调节。这种干预调节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作为占有和分配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财政杠杆来实现的。因此垄断资本主义财政较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财政不能不具有量和质的区别：

1. 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财政主要为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利益服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9页。